

论干校文化的二重性与干校文学的多义性

陈 辽

摘要：干校文化的二重性，表现在人道主义文化与专制主义文化对立；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基因与劣质成份交错；精英文化与庸众文化并存；反思文化与“唯上”文化同在。作为干校文化一部分的干校文学还存有多义性；表现在它是“贬谪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对劳动美的称颂；乐观主义精神的昂扬；逆境中的泰然和自信。深入研究干校文化和干校文学，一定会开拓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取得干校文学创作的新成果。

关键词：干校文化；干校文学；二重性；多义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0-0102-06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读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毛泽东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黑龙江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按照“五七”指示的精神，在庆安县柳河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此后，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级机关先后开办了“五七”干校。其中，以中央文化部系统在湖北咸宁办的“五七”干校最为有名，因为在那里集中了数以百计的知名人士、专家和学者。据后来统计，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五七”干校共106所，各省、市、自治区开办的“五七”干校有1497所，在干校学习、劳动、生活、搞“斗、批、改”的共有几十万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干部。自1968年到1975年，“五七”干校的首尾历史长达八年之久。我作为江苏“五七”干校的一名学员，在干校待了整整四年（1969—1972），离开干校后又经过了下放、归队和改革开放，再回顾、思考“干校”这一“文革”中的特殊事物，我认为，干校文化具有二重性，干校文学具有多义性。

—

人是文化的载体。几十万干部在干校里生活、学习、劳动、思索和“斗、批、改”，必然

出现“干校文化”这一自古以来未有的文化现象。人是各色各样的，各人在干校里的遭遇也是各色各样的，因此各人心目中的干校形象也是种种不一的。列宁在文化史上第一次阐明了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都有“两种文化”^①的思想。在具有数十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作为载体的干校文化里，同样存在两种文化。从历史实际和客观事实出发，干校文化首先具有专制主义文化和人道主义文化对立的二重性。

当时把几十万干部赶到各级干校是干什么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搞“斗、批、改”。斗，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是批“封资修”；改，是按照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对人进行“触及灵魂”的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以及改造原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使之符合林彪、“四人帮”的政治需要。吃苦最大、受折磨最多的是老干部；其次是头脑里还有“封、资、修”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再其次是尚未脱胎换骨、灵魂深处仍有“私”字的其他人员。再加上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将“文革”初期的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和群众作为“反革命分子”往死里打。所以，在干校里，不被斗争、不挨批判、不进行“斗私批修”的人绝少绝少。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抗日战争前的四大名记者（范长江、孟秋江、杨刚、彭子冈〔女〕）之一的范长江，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科协党组书记

记。他在干校里被无穷无尽地“勒令交待”，因检查通不过被视为“死不悔改”，吃尽苦头，终于在咸宁干校里含冤自杀。

《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因对林彪不敬成了“现行反革命”，常常挨斗。他本来有高血压病，又被迫从事超负荷的劳动，终于在咸宁干校里突发脑溢血而死。

著名剧作家孟超，只因写了一部昆剧《李慧娘》，便被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咸宁干校里七斗八斗，病倒了。1973年，干校结束，他成了干校末班“毕业生”。回北京不久，他就死了。

著名翻译家、《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在咸宁干校里种菜、拉煤、做饭。他年龄既老，身体又坏，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后，就死在那里。

历史学家金灿然，是老延安，中华书局领导人。为了不知什么罪被赶到干校。干着抬粪的重体力劳动，也在咸宁干校死去。

冯雪峰，“左联”领导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咸宁干校放鸭。他被批斗是常事。干校解散后回北京，过了年把，老病而死。

阿甲，《红灯记》编剧兼导演。在咸宁干校里劳动改造。干校的广播里，每天都要广播几遍《红旗》杂志上批判阿甲不执行江青修改《红灯记》指示的文章，在精神上对他施加压力。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既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承受声势浩大的批判。同志们看着他那瘦弱的身体，看着他在风雨中迈动着脚步，同情他的人都说：“这回阿甲真的完了！”幸亏阿甲坚信，只要不死，就能看到江青垮台的一天，他终于挺了过来。

青年评论家阎纲，在干校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被斗得差点死去。他归纳出“四人帮”制造冤案的手法有七条：突击审讯，搞车轮战；指供诱供，逼取假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捉刀代笔，强迫签字；断章取义，拼凑“罪行”。“每当我被带到用车轮战术审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暗室时，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②

从上可见，“干校文化”中的专制主义文化在干校是占统治地位的，普遍的，大量的。

但是，在“五七”干校里，除了存在着极端专制主义的文化外，还存在着人道主义的、高扬

着人性美的文化。

看不惯某些人对冯雪峰、牛汉等“右派”和胡风分子的虐待而发出反抗的陈早春，“在封建法西斯面前敢于顶撞”，他说：“地主对长工也不是这样！”这“是多么大义凛然啊！”

他们不只是发之于言，而且动之于行。阎纲在受审查中，浮肿得厉害。“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宿舍，推开门，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真真的泪如泉涌”，原来是原《人民文学》主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递给他的，“又一天深夜，文井同志塞给我一个纸包，打开是一块肉骨头。我狼吞虎咽把它啃个干净”。后来，严文井告诉他：“周增勋他们打死一条狗，偷偷剥了皮，让我烧火，烧火有功，分给我一根狗小腿。我舍不得吃光，留给你啃。香得很吧？可不能说出来！”^③在“五七”干校里，同志之间就是如此相濡以沫，人性美发出了光辉。

和冯雪峰一起放鸭的陈早春，把重活揽过去，尽力照顾冯雪峰，以减轻他的劳动负担。冯雪峰自知放鸭子“干不了，干不好”，请陈早春代他向军代表、连干部请求一下，调回原组去种菜。陈早春考虑，冯雪峰来放鸭子，是出于一种责任心，他请求免除这差事，也是出于一种责任心，“也由于人所应有的对一位老者的同情心，马上向军代表和连干部转达了他的请求”。军代表和连干部同意了。“不然，像他干事这么认真的人，哪怕只与我一起经历一个秋去冬来，也许不要等到1976年，在干校就得向他的遗体告别了”。可以说，是陈早春延长了冯雪峰几年的生命。在干校里，学员之间，中、青年与老年人之间，相互照顾、体贴关怀，是比较常见的。

书法家谢冰岩回忆说：“文化部有位老厨师，他打菜时看见挨整多的人就尽量多给点鱼肉。”谢老每逢吃鱼都会受到优惠，深知这是老厨师鲜明爱憎的表现^④。

二

在干校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基因和劣质成份交错，是干校文化的第二个二重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基因和劣质成份杂陈。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来到了干校，经受着“文化大革命”的“炼狱”式的考验，于是一些人的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基因得到了

弘扬，而另一些人的传统文化中的劣质成份则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坚持真理说真话。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没有说一句无限上纲上线自我谴责的话，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有一说一，是二说二。他在抗战中创办国际新闻社时的合作者，尽管其中的一位已在“文革”中打成“反革命”，范长江仍然在《我的自述》中提到他的名字，无所避讳。

威武不能屈。有人要冯雪峰写揭发周扬的材料，而周扬对他当年被打成“右派”是负有责任的。但冯雪峰在外调人员的恫吓和高压面前，还是没有写一句诬陷周扬的话。周扬事后得知这一情况，在冯雪峰临终前为当年错把冯雪峰打成“右派”而真心向他道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出版家范用在干校于1971年底被“解放”后接到通知，调回北京主管业务。他在听说只调自己未调其他人后，便作出反应：“那不行，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能干校，光调回我一个人有什么用？”^⑤表现了他的“先忧后乐”的高尚精神。

横眉冷对千夫指。侯金镜看见墙上挂着林彪的画像，忿然评曰：“政治小丑。”为此，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干校整天都得参加体力劳动。

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质基因，在他们身上放射出了熠熠光辉。

但是，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劣质成份也在干校里大暴露。

愚忠。明明在干校里挨了批，受了斗，进了“牛棚”，当了“牛鬼蛇神”，但是一旦被宣布“解放”，宣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又立刻而且是出自衷心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就这样虔诚地喊过，也看到许多干校的学员这样喊过。

随大流。在干校里，为什么斗“走资派”、抓“五一六”、“讲用”都能搞得起来？因为只要自己还不是挨整对象，自己还是“动力”，于是也就和大家一起批“走资派”，一起抓“五一六”，一起“讲用”，极少有人以行动表示反对。“文革”之所以只有在中国搞得起来，也因为在“随大流”的人太多太多了。

等待恩赐。在干校里，凡被整对象，总是期待有朝一日上面出台新政策后自己能得到“解放”。对当时的极左路线、极左政策表示反对的绝少。顶多为自己蒙冤负屈申辩，但并不怀疑

“天皇圣明”，因此，念念不忘的是等待上面的恩赐。

三

精英文化与庸众文化并存，是干校文化中的第三种二重性。

在干校里有不少精英人物，这不只是指他们是知名人士，更主要的是指他们在干校里的作为就与众不同。譬如，大剧作家陈白尘，在干校里就写了《牛棚日记》，这是一部今后写“文革”史必备的参考书。陈白尘在当时被审查、已宣布被“打倒”的情况下，仍然如实记载了极左路线横行的情况以及自己在当时的想法。严文井敬佩地说：“陈白尘胆子真大，我当年连动笔的念头都不敢有，他竟然记了那么多！”张光年在逆境中仍不乏幽默。有位被安排批判他的人主动问他，如何应付上面的要求。他回答说：“按照《红旗》上（批判《黄河大合唱》）的话重复一下不就行了吗？”^⑥周巍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作者，“文革”前的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在干校里被安排放鸭子。他想，既然让我放鸭子，就要把鸭子养好，让鸭子多生蛋。他不怕脏不怕臭，去村里厕所掏蛆，冲洗干净带到湖里去喂鸭，因为营养多，产蛋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三。但他属于专政对象，“黑帮分子”，他的艰苦劳动不仅得不到肯定，反被看作“活该”。周巍峙却依然故我地把鸭子放好、养好。著名出版家、语言学家陈原说他在干校，“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精神上受压抑，心却是很红的，还是向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家觉得天有下雨时，但不可能老是下个不停，总有一天会放晴。”这就是中国精英的最可爱之处，忧国忧民。“口头上讲，就老死在干校吧，心里却说，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呢？我们对国家的前途并没有失望，不相信会永远在咸宁受苦。”干校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大致如此。

与此同时，干校文化中的庸众文化也颇为流行。

明哲保身，莫管他人瓦上霜。只要自己在干校里不被批斗就行了，斗别人，抓他人，与我无关。及至斗到自己头上，自己也被搞成“五一六”，才认识到“莫管他人瓦上霜”不对。可是，这时已悔之晚矣。

有的人出于图表现，谋私利，昧着良心在别人身上打主意。英语专家陈羽纶在学习《毛泽东

选集》时，习惯性地把自己认为值得商榷的个别字句标了出来。有位同事临时没带毛著，把他的那本借了去。“过后却几天没还。紧跟着，‘陈羽纶胆大包天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状便公布于众，大字报、批斗会接踵而来”。在干校里，告密的，出卖同志的大有人在。

更有甚者，有人无中生有，举报别人犯下滔天大罪。著名诗人绿原，在干校繁重的劳动之余，又背上了新的精神负担。“有人揭发，他这个‘胡风骨干分子’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指使，通过重审胡风案，‘炮打周总理’，惊得他有口难辩”，幸亏同事中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绿原才幸免于难。

四

干校集中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又遭遇了如此从古未有的劳动惩罚和残酷斗争，因此必然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反思“五七干校”何以成立，“文革”何以发生，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不致在今后重现。头脑里的想法，形于言，表于文，就成了反思文化。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唯上”，相信上面所说的一切，在当时确实这样想：干校是“战天斗地”、“脱胎换骨”的最好场所，因此他们并非被动地而是自动地愿意在干校劳动和改造，形成了“唯上”文化。这是干校文化的第四个二重性。

著名编辑家周明说，“历史在这里沉思”；陈原说：“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咸宁干校）。”陈早春说：“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友情。”^①陈羽纶认为：“文革”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我的体会，中国太穷，许多人的文化素质低，知识面窄，视野不宽，才导致极左思潮有市场，什么事都可以往上贴标签，附和者不少，这其实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这一答案虽然不全面，但在干校里能够反思这样的大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回答，已极其难能可贵。书法家刘炳森在咸宁干校十连，是壮劳力，“八条汉子”之一，干泥瓦工，当钻井队员，干长了，他也进行反思：“说实在的，这样日复一日，专业得不到正常发挥，对国家是损失，对个人更苦恼。”他巴不得早点离开。从国家的损失思考干校问题，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已很不容易。反思文化在干校萌芽、成长、发展、开花，并结出最初果实。

至于“唯上”文化，在当时干校的墙报上、

晚会上，大会发言里，则所在皆是。有一位老编辑曾在去干校前写过这么一首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五七’是一条伟大的道路。知识分子要彻底改变旧思想，‘五七’干校是锻炼新人的熔炉”，“千百人的洪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震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战士激动的眼泪涌上眼眶”。这首诗是这位老编辑从心底写出来的，并无虚假，而且在当时的确反映了许多“五七”学员的心态。当年，“五七”干校里流行这么一首歌曲：“小黑板，一尺三，它的（那个）作用真不简单。毛主席的话儿写在上边，一字一句金光闪！嗨，一字一句金光闪！天天学，天天炼，越学越炼我心地宽。嗨嗨嗨！越学越炼我心地宽。”唱的人很尽兴。“唯上”文化的存在同样是客观事实。

五

如果说，干校文化以其二重性有别于其它文化，那么，干校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干校文学，除了如干校文化一样也有其二重性外，更有其多义性的特色。

干校文学最显著的有别于其它文学的特色在于它是我国历史上“贬谪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屈原放逐，乃有《离骚》”，屈原是我国第一代“贬谪文学”的代表诗人。其后，贬官贾谊、王维、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秦观、陆游、辛弃疾、李贽、林则徐等等许多作家都曾被贬谪过，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称得上是优秀的“贬谪文学”作品。“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干部的集体大贬谪，他们在干校里创作了大量作品，以旧体诗和新诗为多，也有日记和散文。新时期到来后，有了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反映干校生活的《洗澡》。它们的“贬谪文学”特色极其明显。牛汉的诗《那些年》：“那些年/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没有邮过一封信/没有被人握过手/没有叩过谁家的门……/那些年/我默默地写过诗/又默默地撕了/撕成小小的碎片/让它变作蝴蝶/带着诗的斑纹/随风飞到远方。”他在干校时的郁闷，愤慨，呐喊，抗争，跃然纸上。刘炳森在《向阳湖·水调歌头》中写道：“图画里，劳筋骨，识犁锄。勤了锄头镐柄，笔墨俱荒芜。身在江南耕作，心念丹青文翰，盼诏查音书，窃对苍穹问，几日上归途。”反映了大多数干校里的文化人的心情。那时，他们有哪一

位不在盼望“几日上归途”呢？刘岚山的《天鹅》诗，则以调侃的笔调，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极端贬值：“突地一声猎枪把我惊醒，/一只天鹅八斤重，/每斤的价格/——还不到五毛。”假如说，当地市场上天鹅的标价很低，那么，当时知识分子（天鹅）的价值不是同样地不值钱吗？他们的命运和被猎枪打下的天鹅不也很类似吗？顾学颀在干校写下的诗《望门》，更突出地展现了他在干校贬谪期间的心态：“望门无处投张俭（按：张俭曾到处逃避官制造的‘党锢’之祸），春谷何人识杜根（按：杜根宁肯为人作佣保，打零工以避难）？漫野泉鸣声格格，独携黄犬守瓜园。”这首七言绝句，虽然只有二十八字，却喊出了干校受迫害的文化人的心声。“漫野泉鸣声格格”，更写出了当时干校恶劣的政治气氛。程代熙一家三代六口，在“文革”期间分处五地，他的忧思远超过唐代李贺的《七夕》，因此写了一首无题的七律：“辗转无成将半百，金风五度杨排洲（按：杨排洲即程代熙他们在咸宁的劳动场地）。此生已是蹉跎去，每事应从卤莽休。最是难堪身家事，月夜思亲五处忧。不如堂前双柳树，枝枝条条守到头。”他内心的痛苦超过了天上的牛郎织女和李贺笔下的人间男女。陈白尘写在“文革”期间的《牛棚日记》，其中以较多篇幅忠实地记录了他在干校受迫害的生活。陈原称赞这部日记：“有哪一个受难的苦命人敢在那动辄得咎的日子里记下他或他们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感情和真实的生活？谁敢？”“唯其真实，故能极大地打动人。这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新时期到来后，陈白尘在《牛棚日记》的基础上，又写了专门回忆干校生活的《云梦断忆》。比之《牛棚日记》，批判的锋芒更尖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鲜明、生动，对极左路线的控诉更深刻，是干校“贬谪文学”中的杰作。

和《牛棚日记》一样著名的，是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这部作品是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在咸宁和静海长达6年多的干校生活的可贵实录，其思想锋芒不如《牛棚日记》，但作为对贬谪文人的心态的反映，《向阳日记》似更全面和多样。新时期到来后，写干校生活的《干校六记》（杨绛）和《炼人学校》（苑青，即杨静远），最受没有去过干校但却渴望了解干校生活的中青年读者的欢迎。《干校六记》写在杨绛对干校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感受已经沉淀下来的多年以后，因此在揭露干校生活阴暗面时表现出一种淡定和风

趣。如写何其芳把药皂当鱼吃和钱钟书与另一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以幽默的笔致展示了高级知识分子在干校中无奈的悲喜剧。诚如给《干校六记》写《小引》的杨绛丈夫钱钟书所言：“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钱钟书认为，干校里的一般群众，“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曲，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钱钟书的这一补正，很恰当。从《炼人学校》可看出一个女性作家对干校的独特思考。她在《后记》中说，她在干校度过的时光是“值得重视但不必追寻的旧梦”，既清醒，又辩证，可以说是对干校评价的“一家之言”。《牛棚日记》、《向阳日记》、《干校六记》、《炼人学校》这四部著作，保留了有关干校的最珍贵、最可靠的史料，今后谁要研究“文革”史和干校史，都是必须阅读的。

比之“知青文学”，写干校的小说，至今只有韦君宜的《洗澡》。韦君宜是老作家、老编辑家、老散文家。新时期到来后，她以思想解放而又实事求是著名于世。以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情节的生动性来要求，《洗澡》达到了干校“贬谪文学”的高水平。此外，萧乾的散文《“学习模范”》，陈白尘的散文《忆鸭群》，冀勤的散文《黑子的故事》，也都是干校“贬谪文学”中的一时之选。

除干校文学中的贬谪主题外，反映干校劳动美的诗作和散文，在数量上最多，佳作也不在少数。臧克家的《忆向阳》颇为著名，但也有争议。批评者认为，干校的劳动生活哪有这么愉快？哪有这么诗情画意？身在干校劳动过的许多人却认为，“那是老诗人亲身的经历，发之于内心的真挚之情。”（丁宁）在我看来，像丁宁指出的《早出工》、《大风雪，收工暮归》、《微雨插秧》、《老黄牛》等诗作，的确有“真景物，真感情”，“有的，如‘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已成众人传诵的佳句”。我在干校割麦、栽秧、割稻时，也体会过劳动后的喜悦。何况，臧克家在写作这些诗歌时，还在干校，“文革”尚在进行，要求他在那时就具有如今的思想水平来看待和评价干校的劳动生活，也是不客观的苛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要举证王世襄的《观渔十首寄荃猷并序》这一诗作。诗中叙写

了“把钩”、“黏网”、“花篮”、“卡子”、“亮钩”、“围网”等劳动过程，很有诗意，这是王世襄当时的亲身感受，是对劳动美的赞颂，它们是干校文学中的另一“义”，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的。难得的是像苏东海那样曾写过《泵房生活二首》诗作的作者，在新时期对自己的干校诗作，竟做了如此深刻的自我解剖：“从诗中可以看出，我们是多么好统治的高级顺民啊！与文革中那些因抗争而捐躯的志士相比，我们不应该好好反思吗？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哪里去了？我们的灵魂难道不是扭曲着吗？如果都像我这样，还会有天安门的‘四五’运动吗？”

干校文学中的另一“义”，就是在逆境中的乐观精神。这可以郭小川在干校中的诗作为代表。他在《赠友人》一诗中写道：“——过去的，/让它们过去吧，/已经一去不返；/未来的，/时日方长，/奋斗不晚。/此刻呵，/正是继续走上征途的，/新的起点；/我们的道路，也许是曲折的，/然而前程正远！”郭小川藐视极左路线对他的迫害，他在《长江边上“五七”路》一诗里，对未来更寄以理想：“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这整个肌体的，/中心枢纽，/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然而，就是这几句诗，却被曲解为“想回北京”，“不安心走‘五七’道路”而遭受批斗。他在被看管、被隔离的日子里，又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像郭小川这样的不怕压、不怕斗、不怕被折磨、不怕被摧残的乐观主义革命战士，在当时干校里确实是极少数。不过，在干校里对未来充满乐观情绪的也不只是郭小川一个。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像郭小川那样在干校中写下文学作品，或者写了却未能留存下来。

干校文学中的较多作品则表现了一种在逆境中的泰然和自信。他们在干校里虽然被迫害、受折磨，但他们自认不是敌我矛盾，今后终有澄清的一天，因此，他们的作品，显示了一种泰然自若、自信、进取的志趣。这可以沈从文为代表。他在诗作《喜新晴》中写道：“枫槭啾啾语，时久将乱群。天时忽晴朗，蓝穹卷白云。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清。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亲

旧远分离，天涯共此星。”他对“枫槭啾啾语”不满，但他相信“长庚明”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在《双溪大雪》一诗中，他更表现了进取向上的精神：“血气既衰竭，拙诚胜乖巧。虚心能受物，食道易健好。路逢荣启期，相对还一笑。”沈从文在新时期到来后，完成世界闻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非偶然，因为他在干校的迫蹙日子里还是那么泰然自信，进取向上。他在给老伴张兆和的信末说：“吉人天相，诸事放心。不可免有种种矛盾，到时自会解决。”（《致张兆和》）具有如此气度的，岂止沈从文一个。王世襄在干校里创作过一首诗，写的是桂树，显示的却是他自己的“金色凝眸香满衣”的本色：“丹桂谁栽大包围，夹衢双阙势巍巍。轻车驰过争回首，金色凝眸香满衣。”

可见，干校文学确实多义。既有“贬谪文学”的特色，又有对劳动美的歌颂；既有无畏的乐观主义，又有泰然的自信和进取。如此干校文学，既是对以往“贬谪文学”的新发展，又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天地。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干校文学作品还是少了一些。

我相信，随着文化界和文学界对干校文化的二重性和干校文学的多义性取得共识，今后的干校文化研究，干校文学创作，一定会拓宽出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取得干校文学创作的新成果！

注释：

-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39-140页。
- ② 参见李城外编《向阳情结》（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
- ③ 参见李城外编《向阳情结》（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 ④ 李城外：《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 ⑤ 李城外：《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 ⑥ 孙一珍：《我批张光年》，《向阳湖文化报》2005年7月1日。
- ⑦ 参见李城外《守望向阳湖》，《湖北日报》2008年2月15日。

作者简介：陈辽，男，1931年生，江苏海门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13。

（责任编辑 刘保昌）